

高汉良在部队时留影



1970年冬,我穿上绿军装。我曾从卫校毕业,在新兵连集训不到一周就奉命去宣传队报到,担任随队医生。

随队医生扮演翻译官

宣传队的战友来自五湖四海。指导员来自赫赫有名的解放军军乐团,是大管演奏家;老队长来自前卫话剧团,曾参加过《地雷战》等影片拍摄。当时,全军上下都在普及革命样板戏。首长要求宣传队尽快排出《沙家浜》,以迎接全军大汇

演《沙家浜》,见到英雄“严排长”

演。参加大汇演后,还要在防区内巡回演出。

宣传队的战士们个个劲头十足,清晨5点就起来吊嗓子、练习乐器。一天晨练时,我

正在后台为一位演员做康复治疗,战友通知说指导员找我。我赶到办公室,指导员对我说:“根据你的情况,要压给你一个重要任务,在《沙家浜》中扮演邹翻译官的角色。”这让我大吃一惊,没有一点信心。指导员和队长却只是笑眯眯地说:“你行,一定行!”

邹翻译官的戏份不是很重,却也比较关键,戏里的台词也很重要。我来自上海,普通话不过关,“伤”总说成“桑”。光这个字,我吃饭练,走路练,对着镜子练,连做梦都在练,终于过

了关。另外,我的肢体动作也很不协调,战友们不厌其烦地辅导我。我在排练中笨鸟先飞,第一次登台演出竟然OK啦!

在大海边演出《沙家浜》

在参加军里汇演以后,我们便到边防驻地巡回演出,还常常在大海边架起舞台为群众演出。《沙家浜》这出戏,我们前前后后演出了好几百场。

一次,部队首长交办了一个重要任务:到20多公里外的石臼所,为驻防连队和当地乡亲演《沙家浜》。石臼所位于茫茫黄海前哨。我们一早就出发,选择好场地,忙到傍晚才刚刚准备就绪。除了驻防官兵,当地的村民、渔民更是像过年

一样开心,带着短椅长凳,从四面八方赶来。海边广场上人头攒动,黑压压一大片,足足有一万多人。

晚上的演出开始了,可海边的风不小啊!当第四场“智斗”拉开帷幕时,狂风骤起,把背景幕墙刮得摇摇晃晃。台上的演出正在进行,台下则是一场看不见的“战斗”——没有演出任务的同志用双手、身体紧紧顶住背景幕墙,不让它倒下。大家咬牙坚守到第四场结束,我感觉全身都冻麻了。

与一级战斗英雄碰杯同饮

一天,我们到革命老区沂蒙山演出,早就听说当地驻扎着一支英雄部队。现代京剧《奇袭白虎团》中主人公“严伟才”的原型——

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等功臣、一级战斗英雄杨育才,是这个部队的副师长。当时《奇袭白虎团》已搬上银幕,英雄排长“严伟才”的形象在全国引起热烈反响。我心中暗暗期盼:希望这次演出能见到这位现实生活中的英雄!

没想到,这个愿望果真实现了。在演出结束后,大家正准备用餐,忽闻驻地部队的首长赶来看望大家。当时,走在最前面的正是杨育才副师长。我们开心极了,有战友禁不住呼了一声:“严排长来啦!”带动大家一起鼓起掌来。杨育才举起酒杯向大家敬酒,祝我们演出成功,并和我们每个战友握手、碰杯……这次与大英雄碰杯同饮的经历,让我骄傲了一辈子!(上海 高汉良)



活跃在篮球场上

上世纪70年代,我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九师一六七团中学上学。那时,我非常喜欢打篮球。我个子高,有打篮球的天赋,加上球技出众,被选入学校篮球队。在体育老师的指导下,我刻苦练习,成为一名出色的主力队员,经常代表学校参加各种比赛,拿到了好名次。这张照片是1975年我(后排中)和学校球队部分队员的合影。



参加工作后,我又被团场篮球队选中。在专业教练的严格培训下,我的球技更上一层楼,代表团场出征全师每年举办的职工篮球赛,成绩都名列前茅。(新疆 额敏 郭建军 68岁)

铁板上拼搏圆中专梦

1980年7月,我开始了初中生活。学校条件艰苦,桌凳破旧不堪,一些门窗甚至是用平坟弄来的棺材盖木头做的。在这样的环境里,我努力学习。特别是1981年老姑考上中专后,我心中也有了考中专的理想——那个年代,考中专是农村学生改变命运的捷径,初中毕业考上中专的绝对是佼佼者。

初三那年,日子像被拧紧的发条,忙碌又紧绷。每天在家里写作业,我愁得直叹气。家里空间不大,我一直在饭桌上写作业,但饭桌又是一家人吃饭、聊天的地方,人来人往,我根本没法安心写作

业。一天,我突然灵机一动,想起了厢房。那里堆满了杂物,许久没人进去了,说不定能找到个安静的角落学习。我打开厢房的门,在沾满灰尘的杂物堆里翻找,发现了一块盖大桶的铁板。它四方平整,正合适用来当书桌。我又搬来装书的纸箱,把铁板架在上面,一个简易书桌就诞生了。坐在这个“书桌”前,我开始了挑灯夜战的日子。冬天,屋子里冷得像冰窖,我的手冻得通红,握笔都有些困难。但我舍不得离开这一方小小的天地,就不停地搓搓手,哈口热气,继续做题。夏天,蚊虫肆虐,我点



李印龙(右1)等在学校门口

上蚊香继续用功……中考的日子越来越紧张,我也越来越紧张。但一想到自己在这块铁板“书桌”上付出的努力,我又充满了信心。

终于,放榜的日子到了。我早早地来到学校,在榜单上急切地寻找着自己的名字。当看到自己名字后面写着中专学校的录取信息时,我激动得热泪盈眶。(河北大城 李印龙 58岁)

一套房里住进四家人

1959年4月,13岁的我随工作调动的父母由北京来到武汉。我们先是临时租住在汉水边,一年后,单位在市郊盖了家属宿舍,爸爸妈妈算是分到了一间房子——套房里的一间。

当时,那套房子里,里屋一间住着我们一家;外面的“厅”用木板隔开,住另一家;靠大门口的一间,住一家;把厨房和阳台并在一起,也住了一家。原

本的厕所被改造为四家的公用厨房,因此,上厕所只能到外面解决。这套不足50平方米的房子,竟然住进了8个大人、8个孩子,总共16口人。

在这样狭小的空间里,4家人却相处得十分融洽和睦。住在厨房和阳台的一家有医生,哪家的大人孩子病了,不用出门就有医生上门医治。我妈妈做得一手好针线,用一台

老掉牙的“无敌”牌缝纫机为4家人缝补衣服。有一家跑业务,只要从外地回来,其他三家的孩子也有好吃的解馋。还有一家手特别巧,风筝、空竹、陀螺等各种玩具,只要做了,孩子们人手一个……

大约三年后,随着新宿舍楼竣工,四家结束了合住一套房的历史,但还像亲戚一样走动。(湖北武汉 王学华 79岁)

找搪瓷盅惹母亲哭

三年困难时期,我读初中。那时,每到星期天,我去割马草卖给马帮补贴家用,或是同大哥王绍模一起上山捡柴火。有时,我也与同学一起在东门河坝寻野菜,拿搪瓷盅用河水煮来吃。

一次,我和大哥去8公里外的庐山上捞松毛(做燃料),待咬着牙一瘸一拐地背着松毛到家,才猛然发现搪瓷盅被遗忘在山上了。一个搪瓷盅价值七八角钱,在穷人家,这也是一份不大不小的家产呀!于是,我悄悄溜出门,心急火燎地赶回山上,转着圈子找瓷盅。终于找到时,已是夕阳西下,四野无人,山风呼啸,草木摇曳……我在累饿交加中惊恐不已。待我惨兮兮下山后,妈妈失魂落魄般紧紧搂着我哭:“你这个瓜娃子(傻瓜)呀……”

不久,我姨家大表哥考上四川医学院,要离家了却连洗脸盆和水杯、刷牙盅都凑不起,母亲就把这个旧搪瓷盅给了他。表哥拿去连喝水带刷牙,直到参加工作都没舍得丢。(四川凉山 王绍诚 77岁)